

# 全国报刊面临改制风暴

5月9日,国内某媒体的一则报道吸引了诸多报刊界老总的目光: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

这就意味着,全国所有的非时政类报刊要脱离事业单位,变身企业。

5月30日,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沈阳成立,由该公司绝对控股的《辽沈晚报》整体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成为全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晚报都市报类报纸。

## “我是时政类,还是非时政类?”

哪些报刊属于时政类报刊?哪些属于非时政类?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告诉记者:“过去,我们也排过名单,但是按照摸底调查来做的,不作为划分的依据。中央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改革会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来明确。”王国庆表示,一旦文件下来后,被划分为非时政类的报刊将第一批率先转企。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在记者走访的多家报刊社中,也曾有负责人透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几家党政机关报已被划为时政类报刊,但这一信息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

据柳斌杰介绍,目前,全国有非时政类报刊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

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所有企业法人办的报刊,例如出版集团办报、报业集团办报等;还有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所办的行业报刊。其中,已经改制了1300多家单位。

自2003年我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先后在9个省市21家报刊社进行了改革试点。去年年底全国580家出版社全面转企改制完成后,报刊改制就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如同一个前奏,在柳斌杰公开今年非时政类报刊全面转企消息的前一天,5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属报刊——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挂上了“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牌子,率先宣告“事转企”。

“到目前为止,我没收到任何关于改制的通知,但一看到媒体的报道,我就立马联系了中国新闻出版报,了解他们改制的动向。”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劳动午报》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机关报,2000年曾走向市场,打造全国第一张午报形式的都市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2001年又回归机关报。

据柳斌杰介绍,全国有“60%~70%报刊都是亏损的”,它就是其中之一家。

作为地方工会机关报,《劳动午报》究竟算时政还是非时政,成了悬在王兆华和所有员工心头的一把火,让他们有点不安。

“工人报刊有其特殊性,工会作为党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需要一份有特色的报刊为之服务。”王兆华说,“多年前我们就在探索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不怕市场化,我们在意的是必须保持工会报刊的性质不动摇。”其实,王兆华在意的是能否保持与市总工会的密切关系。

北京市总工会的会员单位是《劳动午报》发行的主要渠道。不仅如此,每年北京市总工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补贴,而报社的盈利则主要用来为员工增加工资。

对于机关报的前景,王兆华认为:“北京市的工会会员职工就有400万,有90万家企业,这个市场足够我们生存。然而,一旦改制为企业,重归市场,机关报的定位也会随之消失。脱离了市总工会,也就脱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命脉。”

如果进入市场,《劳动午报》每年的盈利将不再是为员工增加工资,而是支付纸张、印刷和运营成

本,另外还偿还债务。王兆华说,他甚至考虑到改制所带来的最坏的可能,包括完全脱离主管主办单位,这样将会非常尴尬。

对于自己属于时政类还是非时政类报刊,很多报纸都曾疑惑。对此,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告诉记者,这还得等《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

## 《中国汽车报》:“保证改制后员工的社保不会降低”

“他们都说等政策,其实报刊改制的政策早就有了,我们就根据这个来改的。”中国汽车报社副社长李春雷拿着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告诉记者。

今年4月,《中国汽车报》终于进入了中宣部已完成改制单位的名单,可以享受企业税收优惠了。李春雷抱怨说,“工商、税务、财政的程序走得太慢了。”根据《规定》,完成转制的企业可以免收企业所得税,执行时间是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从2010年6月30日被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转企,李春雷经历了整个改制过程。先进行资产评估,然后进行工商、税务的事法人注销和企业注册登记,之后报中宣部批复,进入中宣部的改制单位名单,然后到税务部门办理减免优惠,在社保部门完成所有员工的社保缴纳,整个转企才算完成。走完大部分手续,中国汽车报社用了大半年时间,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环——为转企员工缴纳社保。

“我们早一点走完程序就可以享受3年的减免了,现在可减免的时间只剩下两年了。”李春雷笑着说。在报刊转企方面,由于相关行政部门没有遇到过先例,手续还没理顺,所以《中国汽车报》算是率先尝试着走完了整套程序。而在一年多以前,本刊记者采访作为第一批改制试点单位的《中国汽车报》时,社保是当时压在报社领导和员工身上的难题。

“其实,当时测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国家给予的政策。改制之前从1992年起的社保,国家都‘视同缴纳’,报社只负担、支付改制后的。”据李春雷介绍,“改制时,已退休员工的养老金,继续由财政负担,报社只需补齐身

份转换后的养老金差额部分。这么算,还省了一部分钱。”如今,40名在职员工转企后,每年的社保只需要上百万元就能解决,李春雷说,这对企业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此外,中国汽车报社采取了企业年金的方式来补贴员工社保带来的落差。“我们保证改制后员工的社保不低与改制前。”李春雷说。目前,中国汽车报社一次性拿出1000多万元作为年金基数,以后每年还会缴纳,作为对员工进行激励和补偿的资金。

对于5年内即将退休的员工,中国汽车报社执行了“提前离岗”的优惠政策。提前离岗员工在退休前的5年内工资照发,退休后享受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待遇。中国汽车报社有6名员工可以享受这一政策。有两三位员工选择以企业职工身份留在单位干完剩下几年。

郭明瑞在中国汽车报社做了30多年的行政工作,完全符合报社的提前离岗条件。“我还有儿子要上学,谁知道几年后那点养老金还够不够用,我这几年还得在报社干,报社在发展,工资也在涨啊!”

李春雷说,他们还是看重报社的发展,未来报社在市场化下会越来越越好,转企之后就是成立股份制公司,然后准备上市。

## 政企怎么分?

与《中国汽车报》不同,谈到改制,很多报社的领导笑不出来。一位社机关报的老总说,离开了主管主办单位的资金和资源,自己在市场上没有活路。

媒体将新闻出版总署下属报刊《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改制的表率,实际上,这家报纸也充满了困惑。“我们也就是走了第一步,注册为企业,内部的人员身份转化等还在等政策。”《中国新闻出版报》社长姜军说。据了解,报社内部改制的具体工作尚未启动,困难重重。作为出版行业的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给予支持,而自身的收入只够支付员工工资等成本的部分支出,如果进入市场,则意味着财政“断奶”。



(资料图片)

某报刊负责人告诉记者,脱离了事业单位身份后,存活是行业报刊最大的挑战。许多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很难拿出太多的资金来养活亏损的报刊。

报刊改制转企后仍然归属于上级主管主办单位。但柳斌杰表示,改制后,报刊的主办单位要大批减少。

然而,有些报刊即使转为企业,依然可以依附于主管主办单位,前提是主管主办单位具备足够的财力和支持。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坦言,如果未来保留报社与主管主办单位的隶属关系,北京市总工会将成为出资方,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劳动午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竞报》就是一个“死不掉”的例子。2004年,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共同投资7000多万,打造了《竞报》。一出生,《竞报》就是股份制企业,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

《竞报》已经连续亏损了五六年,仅2006年亏损就达数千万元,后续的经营也未曾完全填补亏空,作为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委宣传部每年都要拿出一笔资金来扶持这张报纸的运作。2009年5月,《竞报》由日报改为周报,将人员缩减至50人,由同样隶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下称“京报集团”)的北京晨报社社长刘顺发兼任社长,如今这张报纸只剩下30人,所有的印刷和发行由晨报兼着做,但京报集团对这张报纸依然不愿放手。

“留着这个刊号也有用,现在这个刊号的价值已经涨到几百万了。”一位京报集团的高层向记者坦言。如果放弃《竞报》,就相当于让别人白白地拿走了一张报纸,集团也不会同意。

刘顺发向记者坦言,如果要对这张报纸进行破产处理的话,也是困难重重。据了解,《竞报》在多年的亏损运营中累计了大量债务,包括纸张、印刷等欠账,一旦破产,一方面债权人不同意,另一方面,如何跟上海文广传媒和北京青年报社两大股东单位协调则是另一个麻烦。所以,“好死不如赖活”。

“我们一直倡导政企分离,但如果我们转企后,我们的上级单位还是事业单位,这不是政企不分吗?”劳动午报社社长助理雷雪凝困惑地表示。主管主办单位能够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然而如何面对事业单位办企业的弊端。对此,北青报社社长张延平开玩笑说,“或许将来会出现一个和管国有银行的金融工委类似的单位,专门来管国有报刊企业。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也有报刊选择了退出。2009年,《中华新闻报》停刊,部分人员进行了分流,部分安置在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记者协会及下属单位。这是首家倒闭的中央级新闻报纸。据了解,自2009年以来,全国已有12家报刊停办、退出。

“报刊社数量多、影响大,一旦关停,如何安置离岗员工成为一大难题。”一位报刊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处理不好就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据《中国经济周刊》



(资料图片)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9 E-mail:cpyp@163.com

## 逃避保障房建设的理由

按照中央部署,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10月底前全部开工。但从部分城市今年以来保障房开工情况来看,成绩并不乐观,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事实上,“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一出,一些地方政府就表示难以完成,原因无非是土地问题、资金问题。

土地会成为保障房建设的障碍吗?有些地方的住建部门为了强调土地难题,甚至表示他们的个别城市已找不到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城市以后就不用建房了。可是,土地出让在哪个城市又停止了?建商品房有地,建保障房没地,让人没法理解。

资金问题,更被很多地方大做文章。可是,他们是否资金问题上真想了办法,让人怀疑。按照住建部关于保障房资金来源的设计,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是一个主要来源,规定地方政府将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房建设。然而,据《第一财经》报道,广州市2011年的预算中,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占不到土地出让金的5%,相对2010年,比例还出现了负增长。种种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方面,还是不认真对待。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方面没有动力,是明摆着的事实。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但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有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上海、北京、杭州、武汉、深圳等城市保障性计划无一完成。而在此前情况更差,截至2006年,我国512个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城市,廉租房投入只占当年房地产投资的0.36%。

媒体报道表明,一些城市保障房开工率不到三成,已经出现了借口,一些人甚至拿起了国家货币政策作盾牌。比如,由于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银行可发放贷款的额度受限,保障房建设缺钱等。想不到面对CPI居高不下、通货膨胀预期加深,国家不得已采取的从紧从稳的货币政策,在这里又添了一个“罪状”。本来,有不少人对这项政策怀着敌意,有人总以中小企业缺少资金为由攻击货币紧缩政策(专家指出,真是大量的资本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没有利润),保障房缺钱的借口,使那些攻击者又多了一个武器。

然而不少专业人士指出,钱对地方政府不是问题,土地价格大幅度攀高,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方面获得大量收益,对保障房有很大的投入空间。而且,保障房建设在筹钱方面有很多路可走,可以土地换房,能获得购房者自身和单位的大力支持,等等。事实上,一些对保障房持积极态度的地方明确表示,保障性住房“不差地也不差钱”。

保障房建设,最需要的还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地方政府有积极性的事,他们总能找到资金。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可以债台高筑,甚至可以挪用救灾专用款;他们不想做的事,则不但不是让路,而且要充当幌子,充当套取资金的工具。

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不能说没难度。但很多“难度说”只不过是借口,如果不执行追责规定,逃避的理由会越来越

## 一边烧钱营销一边治污“哭穷”的吊诡意味

一家年销售额上百亿的制药业巨头,为何宁愿一年花5亿元巨资做广告,也迟迟不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6月5日“世界环境日”,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废水、废气和废渣违规排放再次被曝光,相关报道中甚至指出,哈药总厂产生的“废渣直排河流,硫化氢废气超标千倍”。(6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业内,以黄金时段广告投放为显著特色的“哈药模式”至今仍是医药营销的范例。一时间,哈药广告轰炸模式使其他产品竞相模仿。

时至今日,尽管哈药对广告的倚重有所降低,但哈药在广告投放上的大手笔一直都令市场印象深刻。就事论事,哈药烧钱营销,只是让市场和外地人“印象深刻”,而这家公司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却是比“印象深刻”远为“深刻”的环境灾难。

哈药是这样一家企业:为营销可以一年又一年地大手笔烧钱,说到治污时却总要“哭穷”。

## 别再背着户口负重前行

又是一年毕业时。近日,国务院下发通知,部署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各城市应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允许其在就(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但直辖市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尽管这些年户籍政策松动不少,但大学生毕业生在大城市里落户,依然有门槛限制。比如2009年1月,国务院曾下发《通知》要求直辖市以外的城市,取消对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但条件是必须具有“专科以上学历”。与两年前相比,这次“取消限制”更为彻底,正因如此,该项规定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取消大学生毕业生在非直辖市城市的落户限制,这项内容是《通知》中“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一条中表述的。在大城市落户是大学毕业生的应有权利,充分保障这种权利,或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大学生户口空挂”现象。

就业压力严峻的当下,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算是解决就业压力的一道缓解剂。此项政策受惠的不仅仅是大学生。事实上,一座城市接纳的大学生多了,对城市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福利”。城市的发展由很多资源支撑着,其中,人力资源是其间最重要的一项。尽管高等教育有普及,让大学生们不再是社会精英,但其依旧是人才储备的主力军。人才市场的良性竞争,必然是“优胜劣汰”,凭借的应是个人学识、能力,而非户籍之类的外在条件。如果户口的门槛,让一些大学生不得不远离城市,这对大城市无疑也是损失。因为不管是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的升级换代,还是城市人素质的提升,都离不开人才储备这一关键要素。

心。而企业良心,则会在企业一展抱负的过程中,起到最好的媒介作用。

企业为了利润而忘了其他,为了利润丢了良心,是件相当严重的事情,说穿了,犹如赌徒下赌注,或曰它是在一条险路上狂奔。企业的生长,是因了企业良心,企业的垮掉,是因了企业坏了良心,这不是夸大夸张之语,不是在吓唬谁,它有无数的例证可作证明,有时它就是人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企业如何既言雄心壮志,又保持企业良心?有经济学家开出了“药方”,就是要用一切方法创造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这些方法至少应当包括:配合现代商业行为的严密法律、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消费者本身的精明、经营者本身的自律及社会对企业家的尊敬。除此之外,遇到哈药这样的情况,似还应加上公民自身的维权意识。

今语

##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车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出现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力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力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街谈巷议信息者“瞎猜妄言”,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上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推诿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也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向上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力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吞噬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严论

前行